

聯大模式對 公共知識份子的影響

• 伊斯雷爾 (John Israel)

「以史為鑑」一直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主要話題。人們相信，模範人物的思想和行為能夠起到勸導與激勵的作用。這些模範人物可以是古代的孔子，也可以是二十世紀60年代的雷鋒。行為楷模不僅要受欽佩、具影響，而且必須具有相當明顯的感召力。

人們在尋求榜樣時，主要根據其知識傾向、認同感、歷史理解力、個人境遇及其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在當前中國，官僚資本、貪污腐敗、貧富分化與政治污濁等現象，無不令人回想起國民黨時期，而公共知識份子則很容易為40年代的先賢所激勵。抗戰期間，除了西南聯大（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或「聯大」）之外，公共知識份子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聯大師生的直言不諱，使該校贏得了「民主堡壘」之美譽。

本文考察了聯大知識份子能夠扮演其角色的歷史條件，並提出一些相關的問題，即聯大模式對1949年之後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影響。

在當前中國，官僚資本、貪污腐敗、貧富分化與政治污濁等現象，無不令人回想起國民黨時期，而公共知識份子則很容易為40年代的先賢所激勵。抗戰期間，除了西南聯大之外，公共知識份子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聯大師生的直言不諱，使該校贏得了「民主堡壘」之美譽。

一 聯大的公共知識份子

1938至1946年，北大、清華和南開在昆明組成戰時聯合大學。聯大象徵着中國學院知識份子的決心：保護中國珍貴的學術資源免受戰爭破壞、保持自由教育之明燈在日本侵略的黑暗歲月裏燃燒不息、為戰後的領導階層培養後進。和戰時其他大學相比，聯大最大特色是師生都享有超常自由，其表達的觀念，無論所涉及公共領域之廣泛性、還是所針對公共問題之重要性都說明這一點。

聯大教員在課堂以至各種論壇上都宣傳他們的觀點。同樣，學生則參與各種社團的活動，從官方發起的三青團到共產主義陣營的社團。這些社團定期邀請一些教授在晚間演講，發表學術觀點和對公共問題的看法。一些具有政治意識的教員還有自己的講壇，如「十一社」（推十合一謂之「土」）。學生和教師公開參與各種政治團體的活動，中國共產黨則通過地下支部在聯大活動。校園到處

都張貼着「大字報」。儘管學校周圍的許多茶館裏，牆上都貼着「莫談國事」之類的告示，但對一些敏感問題的討論依然熱烈。

除了為報刊撰寫文章之外，聯大教員有時也出版自己的期刊，如《近代評論》、《當代評論》及《自由論壇》等。在這些刊物中，聯大公共知識份子對許多問題展開辯論：為了戰勝日本，中國應該與西方民主國家還是與蘇聯結盟？蔣介石國民黨獨裁政權是否能改良，或應被一個更為自由民主的政府取代？聯大應與普通大學一視同仁，還是當擁有與其精英地位相應的特殊待遇？將大學遷到農村，建立兼讀制度以打破知識份子和農民間的隔閡，這些決定是否應通過？如果要使中國富強，除了全盤西化之外，還有甚麼其他可選擇的道路？

明知的知識份子極少受到意識形態桎梏。對於知識份子的定位，新儒家馮友蘭摒棄「道德楷模」的傳統觀念，而提倡「學術專家」的西方模式。賀麟拒絕以體用觀念來指導中國的經濟現代化，而贊成用韋伯 (Max Weber)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一書中提出的研究範式。曾就讀哥倫比亞大學的自由主義者潘光旦，主張婦女的地位應表現在家庭之中，這一觀點則遭到「戰國策」派創始人、雲南大學林同濟的駁斥。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聯大公共知識份子始終保持着高度的寬容、文雅和互敬。錢端升主編的《今日評論》具有中間道路色彩，卻接受主張法西斯主義的尼采專家陳銓的論文。而同樣刊載過陳銓論著的右翼刊物《戰國策》，亦給沈從文留出空間，讓他作出「只有民主科學、而非英雄崇拜才能救中國」的回應。《戰國策》同時還發表中左翼教授費孝通、曾昭倫等人的論著。《今日評論》的主編錢端升則歡迎那些反對其開明專制主張的師生投稿。

對公共事務發表看法，中國傳統知識份子視之為責任，而西方自由主義者則看作是權利。不論是當做責任抑或權利，在聯大這一共同體內，所有的成員都認同公開評論公共事務的作法。聯大公共知識份子繼承了蔡元培的精神遺產，強調學術的多樣性、對異端的寬容及學術自由，也就是「兼容並蓄」。這些觀念，結晶於蔡元培時的北大，同時也成為清華和南開的共同財富。

對公共事務發表看法，中國傳統知識份子視之為責任，而西方自由主義者則看作是權利。聯大公共知識份子繼承了蔡元培的精神遺產，強調學術的多樣性、對異端的寬容及學術自由，也就是「兼容並蓄」。這些觀念，結晶於蔡元培時的北大，同時也成為清華和南開的共同財富。

二 從北大「五四」模式出發的聯大

儘管聯大公共知識份子從「五四」先驅那裏繼承了許多精神財富，但他們在諸多方面也表現出與新文化運動模式的不同之處，並進一步擴充了其內涵：

1、蔡元培式學術自由的基礎，是學術與政治的嚴格區分。在給林紓的回函中，蔡元培強調了公開表述與私人表述之不同。公開表述只涵蓋學者的專業研究範圍，而私人表述則可以包括一切話題。聯大沒有把這些限制強加給學者。事實上，一些最主要的聯大公共知識份子都在社會科學領域：張奚若、錢端升、王贛愚及羅隆基在政治學系，潘光旦與費孝通在社會學系，而伍啟元與楊西孟則在經濟學系，他們的發言並不限於自己的專業範圍。

2、在聯大組建的時候，蔡元培的學術自由主義不僅被視為北大獨有的遺產，而且為中國高等教育界廣泛接受。蔡元培關於寬容、多樣性及精英教育等原則，無論對聯大中清華、南開還是北大的教員，都是不證自明的。也許因為

聯大是抗戰的產物，來自聯大的諸多政治批評，多是在戰事推動下發表的。1945年10月，蔣介石將雲南省長龍雲免職。沒有龍雲的支持，聯大這座「民主堡壘」就顯得相當脆弱，師生備受迫害。1945年12月1日的屠殺，次年7月15日聞一多遇刺，標識出了如下的事實：在國家分裂之際，聯大的尊嚴、公共知識份子的安全保證，竟繫於一位開明的前軍閥對異見的容忍。

聯大教授習慣於自由主義，以致於他們都很少費心去清楚表達、論證這些基本原則，故現代試圖重申這些原則的人們，往往忽視了聯大。1998年，作為北大百年校慶的一環，劉軍寧編輯了《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討論了中國自由主義形成時期的北大典型人物。在該書中，幾乎所有章節涉及的時代都早於聯大，關於聯大對中國自由主義所作的貢獻，全書連一條註釋也找不到。聯大體制獨特，可謂空前絕後，與北大作為中國科學、民主、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發源地的形象頗有不同。這是許多聯大成員都講到的，也是北京的北大與聯大——北大在昆明的化身——的特色涇渭分明的原因。但是，毫無疑問，當今對聯大的歷史記憶，幾乎只限於日益縮小的老聯大畢業生群體。

3、儘管「五四」知識份子和他們在聯大的後繼者一直借鑑着傳統士人模式，作政治和道德之表率、講求氣節，但在聯大，這一點更甚於蔡元培時代的北大。在聯大，這一模式因英美學術自由與自由主義的觀念而得以加強。北大的教員有着不同背景，就各自的教育經歷而言，他們是過渡性的一代人。其中蔡元培、陳獨秀等人，都曾獲過功名。而聯大的教員儘管普遍通曉文言文，但同時也受過現代大學教育，而且大部分專職教授都是留洋歸來。和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不同，聯大受過美式教育的人顯然佔了主導地位。

在聯大，不少教授擁有紐約、倫敦或巴黎的博士頭銜，專業的局限，使他們往往對自己學科外的問題漠不關心。而另外一些人則樂於承擔公共知識份子這一角色。由於在各自學科中的學術聲望，他們對時局所發表的聲明就擁有了格外的分量。

4、聯大是抗戰的產物。特別是在戰爭的最初幾年(1937-41)，來自聯大的諸多政治批評，多是在戰事推動下發表的。愛國的要求自然限制了憲政和民主的呼聲，並傾向國民黨一黨專政。只是在中央政府顯得無力保衛中國時(特別是1943年後)，才出現了更為激進的批評。

5、1945年10月，蔣介石將雲南省長龍雲免職，將該省納入中央政府管轄之內。在此之前，聯大公共知識份子一直享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感，顧瞻前後，這種安全感在中國知識界都實屬鮮見。在聯大短暫而多事的歷史中，只發生過兩次教員續聘不成事件。其一為鴉片癮君子劉文典，另一位則是抗直的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羅隆基。羅是聯大唯一因政治原因被除名的人。事實上，沒有龍雲的支持，聯大這座「民主堡壘」就顯得相當脆弱。

隨着龍雲的出局，聯大在最後一個學年(1945-46)出現了校園遭到踐蹋，師生備受迫害的情況。先是1945年12月1日的屠殺，接着是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的遇刺。這些悲劇標識出了這樣的事實：在國家分裂之際，聯大的尊嚴、公共知識份子的安全保證，竟繫於一位開明的前軍閥對異見的容忍。

大學為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提供的制度性保障，在討論聯大公共知識份子的模式時，不可過於強調其重要性。「民主堡壘」這一軍事性的隱喻，意味着單純思想的力量是不夠的，思想只有在強有力的防禦體系庇護下才能生存。人所共見，在這些防禦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軍閥龍雲，他對中央政府心懷不滿，所以自然成為學院裏批評當局者的盟友。但是，若非聯大形形色色、乃至相互對立的思想家對自身共同利益的自覺，龍雲的恩惠就會毫無意義。因此，對重慶當局強加於聯大的課程和考試的抗議以及開設一些有關時政的課程

的要求，不僅來自自由主義者和激進的異見者，也來自馮友蘭等國民黨專政的堅定支持者。馮認為現代中國可以在新儒家的根基上組建起來，這種觀點非常合乎蔣介石的胃口，因而蔣給了馮大量表彰與榮譽。然而，當孔祥熙責難「學術界混亂的言論」時，馮友蘭卻走到了抗議者的前列。

儘管國民黨任命的人佔據了聯大領導層的要津，但卻難以改變聯大的高度自治。當時，梅貽琦校長雖然被要求加入了國民黨，但他保衛了聯大的自由，避免了使聯大受制於黨。心理學教授、聯大三青團負責人陳雪屏和訓導長查良釗很快就融入聯大自由主義的學術文化，幾乎從來沒有嚴格執行過國民黨訓令。在陳雪屏的領導下，必修課「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成了一系列知名教授的講座。1939年，教育部長陳立夫來到昆明，但他除了對校方貫徹教育部政策不力表示失望之外，也無能為力。

三 中共建國至文革時期的聯大模式

建立在聯大模式基礎上的教育體制，主張通識教育、思想寬容和學術自由。陳立夫等國民黨人一直想代之以一種新的教育體制：把教育資源引導到少數實用的學科上，將意識形態強加於教師與學生，以保持思想一元化。他們都徒勞無功。而解放後，中共只用了幾年時間就達到這一目標。

在考察中國學院中的知識份子時，宜將1937-57這一時期視為一個單元。審視國民黨統治的最後十二年與共產黨統治的最初八年，我們可以畫出兩個循環的圓圈。每一次都始於對執政黨的廣泛支持與領袖崇拜：1937年的蔣介石，是國家統一和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象徵；1949年的毛澤東，是中國的救星，這一形象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得以加強。在這兩個時期，公共知識份子都堅信，能夠明確自己與執政黨所約定的界限；但是，由於他們對一黨專政的批評越來越沒有忌憚，以至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間的關係日見惡化。就國民黨而言，從1943年起，這種批評就開始加劇，並於40年代晚期白熱化。對於共產黨來說，批評的大門則是在1956-57年間的「百花齊放」運動中打開的。40年代中期，中國民主同盟作為這些批評的機構載體出現；在「百花齊放」運動期間，民盟和其他產生於40年代的民主黨派領導人也都在「大鳴大放」之列。在這兩個事例中，執政黨都應之以壓制。這又集中體現在40年代中期李公樸與聞一多遭暗殺和50年代後期的反右迫害。對公共知識份子政治迫害之連續性跨越了1949年，王若望的經歷就是一個象徵：70年代，他被關進了30年代曾經被關過的同一所監獄。

當然，兩個政權對公共知識份子批評的回應，也存在一些基本差別，不應忽視。國民黨是一個由不同的政治宗派組成的聯合體，其中就包括一些由公共知識份子組成的政治團體，上述的蔡元培僅僅是其中一個傑出的例子，他是國民黨員，領導中央研究院。共產黨政權內無疑也擁有一些著名知識份子，如郭沫若等。然而，共產黨在組織與意識形態上較國民黨更加一元化，受過教育的人在地位上也逐漸從屬於資深政治家與軍人。正如「反右」這一概念所意味的，通過對批評者中反革命份子的鑑別，論證鎮壓「百花齊放」運動的合法性。反右運動使共產黨竭盡全力。與之相似的是，暗殺李公樸與聞一多後，國民黨

國共兩黨執政時對公共知識份子政治迫害之連續性跨越了1949年。當然，兩個政權對公共知識份子批評的回應也有基本差別。國民黨是由不同的政治宗派組成的聯合體，而共產黨在組織與意識形態上較國民黨更加一元化。在共產黨統治的最初八年，由於公共知識份子對一黨專政的批評越來越肆無忌憚，以至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間的關係日見惡化。

使用恐怖手段來威嚇持異見知識份子的做法也昭於天下，而這些做法則由那些狂熱的激進份子來執行，他們將民主式的批評等同於對偉大領袖蔣介石的不忠。在人民共和國時期，也將批評等同於對最高領袖不忠。

1952年，中國高等教育體制的徹底改組，打破了自由的高等教育體制。在採納蘇聯的高等教育體制時，中國新領導人明顯地否棄了美國模式。業已發展成世界一流綜合大學的清華，卻被整編成為一所工科院校。其他人文類的大學或被關閉，或被解散後零星併入新的院校中去。學校的課程多局限於新興的工程技術專業領域。

聯大的知識份子，曾對陳立夫等作過英勇挑戰，而面對共產黨發起的類似變革，卻顯得相當無助。與此同時，中國高級知識份子經歷了一場思想改造運動，雖然這場運動沒能改變他們心裏所想，但卻非常有效地遏制了他們口中所說、筆下所書。那些曾經對舊秩序的瓦解起過作用的知識份子，在人民民主專政下已變得軟弱無力。在新秩序下，他們的角色是特殊的、從屬的、邊緣化的，概言之，他們是次要的。潘光旦、費孝通、錢端升及張奚若等人，其獨立社會政治批評家的身份已不復存在，同時被分隔開來，以便利用其聲望才能。而文學名流如沈從文、錢鍾書等，均只限於從事一些行政或學術的工作，而得不到鼓勵去繼續出版文學作品。

1949年後，那些曾經對舊秩序的瓦解起過作用的知識份子，在人民民主專政下已變得軟弱無力，他們的獨立社會政治批評家身份已不復存在。經過思想改造，吳宓把自己描寫成「封建地主家庭」和「歐美資本主義教育制度」的產兒。金岳霖則認識到自己起了「阻礙進步的作用」。這樣，他們也就不再能代表聯大模式的公共知識份子了。

1949年後，聯大公共知識份子的模式僅表現於對1949年前之自我的批判。50年代初期，一些令人尊敬的聯大學術楷模交代了他們在解放前的腐朽經歷、思想與文章的反動本性及錯誤的政治方向。錢端升寫道：「(我)基本上是從個人的利益出發的，是遵循資產階級的思想道路的，客觀上是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他還責備自己及其他老一輩教員追隨蔡元培「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原則^①。羅常培承認自己在解放前二十餘年，「無論在教育界還是在學術界都做了傅斯年、胡適之流的偏裨部將，替反動統治階級麻痹青年」^②。吳宓則把自己描寫成「封建地主家庭」和「歐美資本主義教育制度」的產兒^③。金岳霖認識到自己起了「阻礙進步的作用」^④。對過去進行自我清算後，每個人都有了思想的新生。用羅常培的話來說：「我感謝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群眾的幫助，使我認識了自己許多醜惡醜惡的思想。」^⑤這些著名的學者聲明說，有了黨和人民持續不斷的支持，他們將努力不懈地為國效勞。

主流報紙通過發表這些北大—清華—聯大教授的自我批評，為他們的同事與學生樹立了榜樣。這些自我批評表明，只有努力剖析個人在解放前的身份，並最終摒棄它，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才可能轉變成為有用的共和國公民。那些逃避革命並託庇於美國和台灣的人，如胡適之流，則被當作反面的典型，是不可救藥的、不思悔改的美帝國主義走狗，任何拒絕對其個人和政治面貌進行改造的人，都有可能被視為一丘之貉。

經過思想改造，人們認為這些知識份子在兩種意義上可以作為榜樣：作為以前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可以被當作反面教材；作為改造過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現在成了對強大中央政府及其體制和價值的愛國主義支持者，他們是新時期的正面楷模。然而，批判自己的過去，並誓與「北大—聯大」時期的多元主義和學術自由思想相決裂，這些人也就不再能代表聯大模式的公共知識份子了。

對於40年代的知識份子，必須放在跨越1949年的前後二十年這一背景下來理解。在一個救國的時期，啟蒙的守護者備受懷疑，這個國家學術自由最後的呼聲日益被政治極端主義勢力所打斷。解放十年之後，聯大知識份子最廣泛堅持的那些價值，如多元主義、寬容、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等，已變得名聲掃地。只有在「百花齊放」運動的高潮期，少數傑出的聯大公共知識份子，才敢有恢復其在解放前角色的想法，並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提出批評。雷海宗對馬克思主義的絕對正確性提出了疑問，其他的一些人則質疑中蘇聯盟的效果、一黨專政的合法性、低教育程度的共產黨幹部凌駕於知識份子之上的合理性等。這些聲音在反右運動中被遏止，那些大鳴大放者則從學術與政治講壇上被清除。

在反右運動的清洗之前，個體知識份子和英美式的學術自由主義者作為一個群體已不再受到信任。在大躍進初期，那種認為知識份子可以充當正面表率的觀念受到了摒棄。即使是蘇聯模式的大學，也因其精英主義的主張而受到懷疑。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人民大眾化的院校模式，如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在那裏，通過強調創造有用價值是實現政治意識形態手段的課程，教育與生產勞動被結合起來。遙遠的聯大模式已經難以想像。60年代初，人民解放軍成為國家公共機構的模範，而軍人如雷鋒，則成為個人的榜樣。天地之間，已不再有聯大知識份子及其同道的立足之地。

在反右運動的清洗之前，個體知識份子和英美式的學術自由主義者作為一個群體已不再受到信任。在大躍進初期，那種認為知識份子可以充當正面表率的觀念受到了摒棄。60年代初，人民解放軍成為國家公共機構的模範，而軍人如雷鋒，則成為個人的榜樣。天地之間，已不再有聯大知識份子及其同道的立足之地。

四 改革時期作為典範的聯大及其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受到的傷害是眾所周知的。在被迫害致死的聯大公共知識份子名單上，涵蓋了潘光旦、吳晗一眾人等。對於劫後餘生者來說，鄧小平在1978年以後所表達的重視知識份子的態度，給人們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氣息。在1978年之後，聯大及其公共知識份子的精神似乎又得以復蘇。

然而，情形依然相當複雜。前文已言，聯大的繁榮有賴於中國戰爭時期的半軍閥狀態。儘管過去二十餘年的改革見證了政治權力的分散，但「黨國」依然佔統治地位。雖然許多權力已經下放到了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但大學之真正自治、校園之不容侵犯、教員之人身安全，這種聯大模式存在的條件在今天的中國還不具備。大多數已經啟動的教育改革，與其說令人想起現代教育的模式，毋寧說是回歸到國民黨時代的作法。比如清華大學，它在拓展其1952年按照蘇聯模式設置的學科範圍時，與其說是從80年代麻省理工學院那裏獲得靈感，不如說是效法40年代的聯大。

當年自由主義學者及其批評者之間對話的某些主題，在今天依然會成為問題的焦點。由於學術自由的核心信念仍為國外認同，自由主義很容易遭到孤立。啟蒙式自由主義的一個關鍵特徵，即對官方政策和絕對真理持懷疑態度，與正統觀念格格不入。40年代以來，對這一立場的不同實踐方式，將公共知識份子分成了兩種類型：一種人敢於面對當局，而另一種人則試圖在體制內活動。錢端升就是後者的典型。錢端升是老於世故的政治學家、國民黨中持改革思想的成員，作為《今日評論》的主編，他主持着公共知識份子的一個重要論壇。當撰稿人提出對三民主義意識形態應持懷疑態度時，錢氏加了一條簡短的

在共產黨統治下，危及公共知識份子命運的因素是一個始終存在這種歷史記憶：正是這些公共知識份子促成國民黨統治的瓦解。中共領導人完全知道在使舊執政黨名聲掃地的過程中，思想很重要，尤其是當這些思想擁有某些公共機構(如聯大)的支持。在一般的情況下，中國知識份子必須依靠一張由朋友、同學和政治庇護者所織成的關係網，為他們的公共知識份子活動提供保護。

編者按：「懷疑第二，信仰第一」^⑥。1990年錢氏去世時，已由一個失敗的國民黨改革者轉變成為光榮的共產黨知識份子。錢端升在國民黨「黨國」時期所作的自由化努力，在1949年以後也有意識形態上的後繼者：那些宣稱支持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的人，卻試圖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詮釋它們，以至於在討論一些具體問題時，實際上可以不受限制。

對所揭露的真相進行批判性地審視，這是聯大各派知識份子的一個共同特徵。這種做法在40年代曾受到國民黨右翼份子的質疑，而在1949年以後，則面臨着極左份子同樣的責難。1940年，陳立夫的親信潘公展在《中央日報》對「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即對知識份子的懷疑主義和思想自由發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攻擊^⑦。無獨有偶，《雲南日報》於1982年發表文章，警告學生不要盲目閱讀那些令人「思想混亂」的西方哲學著作^⑧。

1949年前的國民黨在意識形態方面對富有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進行攻擊，這種情況同樣也發生在1949年後的共產黨身上。術語的變化掩蓋了內容的相似。那些站在政治與文化排外立場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能從蔣介石《中國的命運》一書中看到與馬克思主義相似的主張——儘管其中沒有馬克思主義的術語。那些帶頭倡導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人，表面上是擔心從香港與西方所輸入色情文化的有害影響，這是他們與國民黨的主要不同。但其核心要求卻都是不加批判地絕對服從執政黨，這一文化傳統是國、共兩黨所共有的。

在共產黨統治下，危及公共知識份子命運的因素是一個始終存在的歷史記憶：正是這些公共知識份子促成國民黨統治的瓦解。中共領導人完全知道在使舊執政黨名聲掃地的過程中，思想很重要，尤其是當這些思想擁有某些公共機構(如聯大)的支持。他們很清楚，這些知識份子會帶來甚麼問題。當吳晗撰述《海瑞罷官》時，毛澤東當然記得：正是這個吳晗，曾尖銳批評明朝的裙帶風習、官場腐敗，以影射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同樣，在1989年，北京當局採取強硬措施鎮壓學生示威時，執政者不會想不起半世紀前，他們和同學是如何通過示威抗議蔣介石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綏靖政策，並最終促使國民黨政權喪失合法性。

在80年代的中國，甚至美國的存在有時也會引起人們對40年代昆明情形的回想。1946年7月，聞一多應槍而倒，也打碎了大學師生在戰時幻想的安全感。聞一多遭暗殺後，一些持異見的聯大公共知識份子到美國領事館請求庇護，就像方勵之在四十三年之後到美國大使館尋求避難所一樣。在面對着極權國家的致命威脅時，那些珍視自己生命與自由的公共知識份子就會本能地馬上投奔最近的美國外交領地。

然而在一般的情況下，中國知識份子必須依靠一張由朋友、同學和政治庇護者所織成的關係網，為他們的公共知識份子活動提供保護。從結構上看，聯大模式最適用於當前的是，由在執政黨裏的大學人士(蔣夢麟、張伯苓，顧毓琇)或執政黨派往大學的人士(陳雪屏、查良釗)提供緩衝保護，這種保護者和保護對象的關係，也就是所謂的「後台」現象。然而，提及這些，還必須補充一點：首都政治庇護者的重要性，國民黨時期遠低於人民共和國時期。沒有龍雲在昆明保護聯大師生，單是重慶的有權有勢的朋友並不足以使他們免受國民黨法西斯份子的暴力威脅。

聯大知識份子集低經濟、高文化地位於一身，他們以清貧為榮。當前中國知識份子之貧窮，是相對那些暴發戶及腐敗的官員而言的。但在40年代，聯大知識份子卻是絕對貧困。今天出現了一個高級知識份子中產階級，他們在富豪行列後附驥。未能夠廁身其間者，也與他們戰時昆明先輩的境況大不相同。在昆明，知識份子將清貧看成為國家事業所付出的犧牲，而今天，不名一文的知識份子無論在社會上還是在經濟上，都處於邊緣地位，遭人憐視。

今天的楷模並不是那種作為知識份子的知識份子，更不是作為社會批評家的知識份子，而是作為專業人士的知識份子。如果有一個官方認可的知識份子模範，那將是一個為了推進祖國的現代化建設而放棄西方資本主義奢華生活的學者。當然，聯大的知識份子也是從國外回來，但在輕易實現轉變的同時，總仍部分地保有一個超越國界的知識份子世界(即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所謂的「中國的自由黨人」)，這使他們得不到官方信任。

在80年代的自由化時期，聯大公共知識份子中具有近似榜樣地位者，除了聞一多、吳晗，還有一個在聯大時期並不特別，卻因寧可餓死也不食美國救濟糧，而獲得聲望的公共知識份子朱自清。三人以外，聯大知識份子很少被單獨提及。當然，他們還是「五四」傳統中自由學術文化的化身，是歷史的一部分；在民主與科學的聖殿中，他們備受尊崇，卻又鮮為人知。

80年代，隨着聯大校友網絡的重現，以及許多關於聯大及其師生的文集、回憶錄、傳記及自傳等的出版，西南聯大被重新帶進了中國社會的意識之中。在這些書出版之前，大多數關於解放前中國大學的論著都是偏政治性的，如學生運動、國民黨的迫害、共產黨地下組織的作用等，對於發端於北大、並在聯大達到頂點的自由教育模式，則抑揚失實。最近，我們看到一系列傑出的聯大公共知識份子的著作、以及關於他們的書籍、論文、選集。這一群體已不僅限於聞一多與吳晗，也包括了曾昭倫、潘光旦和馮友蘭等。此外，聯大畢業生對母校及師長充滿讚美的文字，更導致了一股真正的出版浪潮。

許多聯大楷模在今天受到敬重，並不僅因為其40年代的言行，而是解放後的表率行為。如陳寅恪，在聯大的年頭裏幾乎算不上是「公共知識份子」，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其堅決不對政治迫害低頭，而成為了公共知識份子。吳宓，聯大時期著名的怪人。解放前一直痴迷於《紅樓夢》，並鍾愛着一個名叫海倫的女人。由於他對政治事務的極端反感，以至認為聞一多是死於政治派系鬥爭，公開拒絕為聞氏遺屬捐款。90年代之前，像吳宓這種人，往往會成為譴責嘲弄的對象。但現在，很多人放棄了狹隘的政治標準，而採取一種更為寬容的態度。在過去十年左右，隨着中國社會與文化潮湧般的變化，吳宓的聲望穩固地上升，因勇敢反對「批林批孔」運動而贏得了人們的敬重。有研究者進一步指出，吳宓、聞一多同樣是愛國的，二者唯一的差別在於，聞一多的愛國主義源於中國本土的民粹主義，而吳宓則是在西方的個人主義中陶鑄而成^①。

這種對「愛國主義」的界定是寬泛的，其範圍覆蓋了聯大的絕大多數教師，從聞一多到吳宓，每一個人在其中都有其相應的地位。意味深長的是，吳宓之成為楷模，不僅是因為他堅決地反對「批林批孔」，更主要是在於其固守着一個領域，在那裏，個人可以有尊嚴地反對政治壓迫與說教者的非難。如果說聞一多代表了這樣一種範式：將內在的私人生命與外在的公共生活融為一體，並從這一傾

聯大知識份子集低經濟、高文化地位於一身，他們以清貧為榮。當前中國知識份子之貧窮，是相對那些暴發戶及腐敗的官員而言的，聯大知識份子卻是絕對貧困。今天出現了一個高級知識份子中產階級，他們在富豪行列後附驥。而不名一文的知識份子則處於邊緣地位，遭人憐視。今天的楷模並不是為社會批評家的知識份子，而是作為專業人士的知識份子。

向中獲取力量，以其詩性的靈魂來作政治之表白，直至以身相殉。那麼吳宓所代表的模式正相反，他們只是說出當代知識份子的一些需求，他們並不想去攻擊權力堡壘，只是想過一種單純的生活，遠離政治和社會強制的所謂正確性。

五 二十一世紀的聯大模式

今天，中國知識份子試圖將聯大公共知識份子樹為楷模，必將面臨着一場艱苦的戰鬥。一些聯大知識份子所信奉的理念，對於新時期來說已不合時宜。許多論爭不休的自由主義者在尋求共鳴時，往往從波普爾或哈耶克等一些外國的名字那裏獲得更大的權威性。

今天，中國知識份子無論直接或間接試圖將聯大公共知識份子樹為楷模，都必將面臨着一場艱苦的戰鬥。大多數接受過英美教育的聯大知識份子都是固執的特殊份子。一些聯大知識份子所信奉的理念，對於新時期來說已不合時宜。許多論爭不休的自由主義者在尋求共鳴時，往往從波普爾(Karl Popper)或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等一些外國的名字(而非張奚若、羅隆基等)那裏獲得更大的權威性。再者，撇開抗戰時期與當前中國的一些明顯差別，兩個時期的諸多相似之處，如一黨專政、官僚資本、貪污腐敗、貧富分化及城鄉矛盾等，都具有負面作用，可能引起政治上的激烈反應。只有展現出一種非凡的政治勇氣，才可能從兩者的類似中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

然而，在西南聯大解散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發掘出潘光旦和曾昭倫之類公共知識份子，與較少公共性的陳寅恪與吳宓等人，到底意味着甚麼呢？一個方面是，簡單透過有關人物著作的出版，可以質疑政治精英黜陟古人的特權。與「向雷鋒同志學習」的時代不同，現在通過在公共領域提供競爭模式，可讓人們去超越官方標準。

在今天中國的學術長廊上，儘管還飄蕩着聯大的游魂，但是，若要使一個作為公共知識份子之機制性模式的聯大重生，仍然是不合時宜的。

郭曉東 譯

註釋

①④ 《人民日報》，1951年11月6日；1951年11月10日。

②⑤ 《光明日報》，1952年7月8日。

③ 《大公報》(香港)，1952年8月10日。

⑥ 《今日評論》，4.14:272，1940年4月27日。

⑦ 《中央日報》，1940年5月12、13、14日。

⑧ 《雲南日報》，1982年5月7日。

⑨ 徐葆耕：〈紫色清華三則〉，《作家雜誌》，2001年第2期，轉引自《聞一多研究動態》，2002年第6期(總第26期)，頁2-4。

伊斯雷爾(John Israel) 弗吉尼亞大學歷史學教授。其研究領域主要在中華民國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並關注學生和知識份子問題。主要著述有：*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他目前正在研究的課題是「五十五個知青」，一個對中國60年代人(Sixties Generation)的微觀研究。